

□明生

### 战时医学犯罪

731部队本名为“满洲第七三一部队”，自1933年初建到1945年灭亡，曾使用多个名称。一般来说，731部队通常代指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本部及各支部，如今已成为日本战时医学犯罪的代名词。

医学犯罪，即医生与医学者以医疗为名实施的犯罪。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，参与、协助、命令、教唆、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的计划及项目，在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、残暴、虐待、酷刑、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，显然都是医学犯罪。《731：医学的沦陷》所述的医学犯罪，特指战时日本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。

杨彦君认为，这些人体实验，无论从受试对象来源，还是从实施目的和性质来看，均与医学界定义的人体实验有着本质差异。战时日本的人体实验是非法的，在实施犯罪的手段上，采用了医学的技术方法，可结果导致全部受试者被残害致死，是骇人听闻的医学犯罪、战争犯罪和反人道犯罪。

据美国馆藏的731部队人体实验报告，可以断定该部队采取直接口服、针剂注射和环境感染等方式，进行了大规模炭疽、鼻疽、鼠疫、伤寒、甲乙型副伤寒、细菌性痢疾和霍乱等人体实验，并在实验报告中记载了感染力、直接感染、免疫实验、喷洒实验、炸弹实验、意外感染、实验室感染、媒介物感染等详细数据。

731部队人体实验的主要目标昭然若揭。一是以生物战防御和攻击为目标，进行深层次观察，即把炭疽杆菌、鼻疽杆菌等作为生物制剂，通过呼吸系统和皮肤感染来观察感染路径并测定感染效果，进而做出攻击性生物制剂的优先选择。比如在《费尔报告》中，就记录了鼠疫、炭疽、伤寒、痢疾、霍乱的感染方式和感染效果等相关信息。二是进行传染病学、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等深度医学研究。从受试者选择、实验设计、病理解剖到报告最终完成，全部采取医学的技术手段。

1933年至1945年，日本公然违背《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》《日内瓦议定书》等国际公法，准备和发动了大规模细菌战。作为日本策划、组织和实施细菌战争的核心机构，731部队是细菌武器研究、制造和使用的军事基地，为细菌战进行了大规模室内实验和野外实验，征购和饲养大量黄鼠、白鼠、兔子等实验动物，培育了跳蚤、虱子、苍蝇、蚊子等传染媒介物，对鼠疫、霍乱、伤寒、炭疽、鼻疽、结核病等数十种传染病展开大规模测试和研究。

吉林农安、大赉、浙江衢县、宁波、湖南常德、江西上饶、广丰、玉山，都是细菌战重灾区。例如，1941年11月4日，731部队成员驾驶飞机，在常德上空投下了谷麦、跳蚤、棉絮、纸片等物品，投掷地点集中在常德城区的鸡鸭巷、关庙街和东门一带，随后引发鼠疫大流行。1996年11月，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成立，这一民间组织主要由退休教师、医生、工人和受害者家属组成。调



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

## 撕开“医学研究”面具 揭露战争暴行的真相

这是一项用20年时间搜寻中外史料，伏案创作的学术坚守。学者杨彦君的新作《731：医学的沦陷》，以战时日本医学伦理全面崩塌为主线，再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（以下简称“731部队”）的肇建、扩张与覆亡历程，剖析了暴行背后的国家政治逻辑、社会制度症结与医学体制畸变。在铭记历史、回望真相的坐标上，该书传递出深刻审视：当医学挣脱伦理，比枪炮更为致命。

查委员会调查座谈30万人次以上，整理了15000多份控诉材料，确定了第一批7643人的死亡名册。

日军的每一次细菌战，都导致疫病大流行，尸横遍野、万物萧条，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伤亡，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环境。

### 罪犯登堂入室

二战胜利后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医学案件审判中，16名纳粹医生被裁定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。《判决书》中写道：“从1939年9月到1945年4月，所有被告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，主要参与、协助、命令、教唆、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计划及项目。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、残暴、虐待、酷

刑、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。”

《731：医学的沦陷》指出，以上述纳粹德国医生为参照，那么731部队成员的医学犯罪，理应受到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指控，并据此追究战争责任。然而，历史并没有照此发展。战后，731部队整建制部队撤回日本本土，相关成员逃脱了A级、B级和C级战犯审判，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731部队的秘密，随着知情者的集体沉默而被掩盖下来。

让人气愤的是，他们不仅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，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日本高等院校和医药企业担任重要职务，有人担任大学校长、医学部长和协会会长，有人开设私人医院，创办医药公司、疫苗公司和医学研究所等。如内藤良一、北野政次、吉村寿

人等，俨然是硕果累累、功成名就的医学名流，成为日本医学界的代表人物。

这与731部队性质有关。其中的高等军官，几乎全部为军医将校和高等技师，多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等知名院校，拥有博士学位。这些接受过精英教育的“高材生”，在731部队任职期间，有经费充足、设施完备的工作条件，可以“毫无限制”和“完全自由”地开展各种大规模细菌实验、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，从而取得异于常态的解剖技能、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。他们利用各种实验数据，发表了数千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，成为日本医学界的重要“学术成绩”。

1955年之后，这些战争的罪人甚至公然成立了各种明目的战友会组织，定期在东京、京都、

大阪等地集会。森村诚一在《恶魔的饱食》中，记述了这一情况。1981年9月5日，“房友会”首次以731部队为名义召集战友集会，共有19人参加，当时请柬封面写着“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战友会第一次全国大会”的字样。直到如今，“守望”和“慰灵”731部队的身影仍时隐时现。80年过去了，现在日本还有人公开“祭奠”军国主义的“亡灵”，主动割断真实的历史记忆，这样的现状怎能不让人警惕？

### 发出中国声音

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聂精保说：“每当思考、谈论和描写日本医学暴行及其战后处理这一话题时，我就感到受害者的灵魂正在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。”时至今日，如何回顾、反思和书写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、医学与伦理、冲突与和解等重大问题，早已沉重地摆在东西方学者的面前。

《731：医学的沦陷》指出，以历史学的后见之明来看，战时日本人体实验大屠杀之所以发生，既有日本举国战时体制下国家政治、社会制度和医学体制驱动力的因素，也有军国主义思想主导下，作为医者的个人主动迎合这种驱动力的因素，在“战争与医学交叉渗透”的时代环境下，这两种驱动力的内外结合最终导致了医学暴行的持续发生。

关于日本医生的医学暴行，海外学者从生命伦理层面，展开了极富成果的探讨，但较少触及日本医学暴行的犯罪本质。“实质而言，战时日本的人体实验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意义上的实验范畴，受试者全部被残害致死即是明证。因此，战时日本的人体实验在性质上属于战争犯罪，只是在实施犯罪的手段上使用了医学的名义或医生的技术。”杨彦君指出。

正如日本学者小俣和一郎在《验证人体实验：731部队·纳粹医学》一书中写的那样：“如果脱离了731部队和纳粹医学这两个大的历史问题，任何见解都是空洞的。”如果没有将医学暴行定格在战争犯罪的前提下，而单单进行生命伦理反思是不够的。一些海外学者将何以发生医生大屠杀，归结于东亚的伦理价值。杨彦君认为，这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，那就是在伦理学对话开始之前，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医学暴行的战争犯罪性质。

近些年，围绕731部队问题，中国学界在人体实验、生物战犯罪、战争责任和战后影响等宏观方面均有研究，并对生物战术、生物战剂、生物战理论、生物武器等微观问题也有所涉及，还展开了731部队遗址发掘、保护和申遗等应用研究。

杨彦君还谈到，提升历史叙事、文本解读和社会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《恶魔的饱食》就是以纪实文学手法，向公众揭示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，引起强烈反响，推动了各国对731部队的史证调查、学术研究和国际传播。关于731部队的历史记忆、历史认识、历史叙事，不仅需要历史学者的持续查证，也需要社会层面的认知、普及和推广。

（作者为书评人）

### 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731：医学的沦陷》  
杨彦君 著  
中华书局



《恶魔的饱食：  
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》  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  
骆为龙 陈耐轩 译  
学苑出版社



《恶魔医生：  
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》  
〔英〕马克·费尔顿 著  
李学华 译  
华章同人 | 重庆出版社